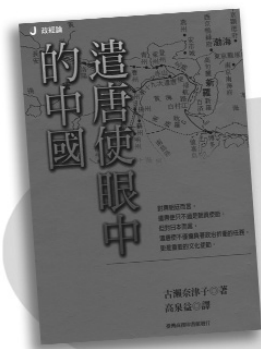




文化相遇者的模式——

評《遣唐使眼中的中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陳建守



遣唐使眼中的中國
古瀨奈津子著；高泉益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 9407 / 200元
ISBN 9570519835 / 平裝

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是一本考察日本遣唐使遊歷中國的見聞錄。作者討論的時代距今近1500年，追究如此久遠的事情似乎與日益邁向現代化，乃至於後現代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然而，回到這些承載外交任務的遣唐使活躍的年代裡，透過他們的眼光所呈現的浮光掠影更能增添我們對唐代的了解。

現在的學術著作是很講究關鍵詞的，用以凸顯一篇文章或整本著作的主題。「遣唐使」無疑是這本著作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詞。所謂「遣唐使」，是指日本所派遣的文化使節，去向唐代的皇帝獻上朝貢品，以達到與唐攀結外交關係的目的。並確認與唐代達成關係所必要的各種儀式。作者即希望以這樣的觀點，來探討遣唐使在唐代朝廷中，實際上參與或觀摩了哪些儀禮。藉著對儀式的探

討，來重新思考遣唐使的意義（頁187）。而這些見聞，究竟在政治與文化上對日本產生了什麼作用？而遣唐使的成員在唐所參與、觀摩的這些儀禮，拿來跟日本所制訂的儀禮相對照，究竟當時日本社會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程度如何（頁2）？

本書除序言與結語不計，共有四章。底下則就各章內容作簡要介紹，再提出個人的淺見。作者首先對遣唐使作一概略的陳述。關於遣唐使派遣的次數大致被認為總共有二十次。派遣的頻率平均每十六年一次。遣唐使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與後期的遣唐使在目的、組織、航路上有顯著的不同。前期指的是第一次至第七次。這個時期因朝鮮半島正陷入動亂中，由唐所支持的新羅與日本支持的百濟相互爭奪霸權，在這個背景下，這個時期的遣唐使擔負著政治折衝的任務。後期遣唐使的派遣，除了向唐代的皇帝獻上貢品，確認在以唐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中之定位外，反倒是在法典、文化、文物之類的輸入任務上比重增加（頁3-10）。

首章，作者概述了遣唐使的任命、造船工作以及出發前的種種儀式。經過了這些儀式，遣唐使一行人就從平城京或者是平安京

出發，造好的船隻也已經停泊在難波港，展開一段文化交流的旅行。

第二章，作者描述抵達中國的遣唐使的生活情景。於此，作者利用了遣唐使隨行請益僧圓仁的旅行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的記載。遣唐使最常停留的地方除長安外，就是越州、明州、揚州等長江流域的各大都市。其中圓仁曾停留並留下詳細記載的就是揚州（頁 28）。作者先介紹了揚州的交通位置與都城構造。並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對「國忌行香」的儀式描述，與日本的國忌祭典相互比較，從中得出中日之間的差異。作者推論在日本平安前期，天皇與皇后的七七日甚至是一周忌，只在都城或周圍的寺廟舉行，不像唐代將整個國忌儀式推廣到全國舉行。唐代把國忌推廣到全國舉行，此舉是爲了向地方誇示皇帝的威權。從這一點差異來看，唐與日本的皇帝權力在結構上是不同的。唐代比較中央集權，而日本天皇的權力只有在畿內的範圍（頁 42-43）。總而言之，唐的儀式屬於全國性的儀式；日本則是以天皇爲中心，地方則以國司爲中心的雙軌制度。除了國忌行香的儀式以外，圓仁在揚州也經歷了祈雨儀式。唐代祈雨的形式，不僅止於佛教或道教的形式，還包括了其它各種形式。從這裡我們可以得知，由於圓仁身爲宗教人士的關係，所以透過他的眼睛所觀察到的中國風情，大致上是以宗教的記載爲多。這也是閱讀本書時我們應該時時提醒自己的一點，這樣具有文化刻板印象的觀察，是帶有文化偏見的。接著作者介紹了唐代詔書的儀禮與公文書的傳達，並且把日本的詔

敕與傳達和中國的情況作比較。作者在這幾點上都以描述場景居多，深層分析者少，而使筆者未能窺其儀式差異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義爲何。

第三章，作者開始描述遣唐使到了都城長安的生活。首先對長安城的建築型制以及都市配置作描述。接著利用《開元禮》對賓禮的記載，來說明遣唐使晉見皇帝的儀式，這當中包括了國書的行使問題（頁 104）以及朝貢品的樣式。當然，在接受了使節們的朝貢以後，皇帝也會舉辦宴席並賜物給外國使節。這樣的舉措，是表示對臣屬者庇護的象徵。在維護以大唐爲中心的國際秩序上，具有很大的意義（頁 117）。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除了對國宴與賜物的記載外，尚有賜予官職這一項。這些遣唐使的領導階層會獲得皇帝賜予官職。由唐皇帝授予官職所代表的意義，就等於變成皇帝的臣子了。但是，遣唐使所得到的只是一個空的官位，並沒有實際的權力和爲唐皇帝效命的義務（頁 120）。從這個地方我們可看出《開元禮》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之間記載的差異。《開元禮》中所重視的，是透過晉見與賜宴的儀式，來達到確認唐皇帝與蕃國主或蕃國使者的君臣關係的目的。國書、朝貢品、賜物等只是儀式中的小道具而已，儀式本身才是重點。因此，由唐皇帝頒賜的國書或賜物，在《開元禮》中就不容易得見了（頁 125-126）。與前一章相同的敘述策略，作者把目光移到日本，來看日本是以什麼方式舉行外交儀禮。古代日本賓禮之確立，就是律令國家的成立以及象徵性的統一國家形成。



最後，作者描述了遣唐使所參加的朝賀儀式。所謂的朝賀儀式就是指朝中官員跟諸蕃大使向唐皇帝拜賀新年的年初重要儀式。朝賀是非常大規模的儀式，是在每年例行舉行的儀式中最具重大意義的一項。朝賀的特色是，皇帝接受內外的官員、諸蕃使節與諸州、諸蕃的貢物，這些東西象徵著皇帝支配各國領土，可以說是一種中華思想的具體呈現。朝賀是爲了彰顯以皇帝爲中心的大唐帝國整體國威架構，讓世人得以目睹而舉行的儀式。以此活動顯示皇帝的權威，讓參列的內外官員、諸蕃使節，能夠再次確認自己與唐帝國之間的身分與定位。而這些遣唐使者便成爲皇帝爲顯示其權力、權威所及範圍時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頁143-144）。

第四章，作者說明的是日本的儀式與唐的影響。日本朝廷的節日儀式與慶典的原型，是根據唐令的節日作爲儀式和慶典的原型（頁170）。日本的節慶在接受唐的影響後，過去的咒術成分已經去除不見。在派任大臣的儀式與立后、立太子的儀式上，有關宣讀宣命的部分，也是仿照唐禮宣讀冊書的儀式編纂而成的。不過需要提及的是，日本導入唐禮並非照本宣科地接受，而是以大寶律令所定立的節日，在朝廷舉行的儀式與慶典爲範圍進行唐化（頁180）。儀式的唐化所意味的就是把原來日本咒術性質的，藉意識形態爲力量的時代，加以扭轉改變，換成以唐禮作爲基礎的新理念，希冀在日本的社會中，建立這種新理念，以維護天皇的統治權威（頁184）。

本文重點式的介紹工作已如前述。作者

詳盡地描述了遣唐使在中國的行爲舉措及其所觀察到的中土風情。但閱讀時筆者也難免感到有些遺憾與疑惑。其一，帶有文化偏見眼光，且是外國人的遣唐使；在中國權力中心生活，異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相遇，在文化交流過程中應有的戲劇張力在本書中是看不到的。作者光是平鋪直述遣唐使的行爲舉措，讓遣唐使這個好題材無法得到最好的發揮，實感遺憾。

其二，作者看重身爲文化交流者的遣唐使的這點，我可以理解他是爲了比較中日兩國歷史的差異。但除此之外，遣唐使發揮了什麼功用嗎？這些使節只因爲承載起本國的外交工作就值得多讚一筆嗎？遣唐使的重要性就在於他們背負了與其日本境內同儕不同的使命嗎？還有，遣唐使的文化使命並不因中日發生戰爭（西元六六三年）而終結（頁8）。否則日後十餘次的遣唐使派遣活動無由發生（頁9）。作者僅止於描述遣唐使在中土的種種文化活動，卻忘了深入分析這些儀式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致使筆者未能窺窺作者更深一層的歷史思維。

其三，作者經常以正史沒有記載的來推論某種儀式可能不存在的理由（頁54）。筆者以爲這是犯了輕信的錯誤，也與作者一開始的寫作方向相悖。作者之所以要利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的記載，就是要補足正史中沒有記載的缺憾。怎麼可以未加詳細查考其它的文本，就逕自下定論呢？

其四，作者提到日本並非單向地接受唐代的儀禮，而是經過有意識地選擇後才形成自身的儀式（頁180）。唐禮與日本接觸後，

哪些被留下，哪些被去除，才是敘述的重點。這不僅可看出日本文化的特性與中國文化有哪些扞格之處，也可看出中日社會的異同。而不是不斷地強調中日社會秩序上的差異（頁174-175）。

最後，作者在談到中日往來國書一節時，說明由日本發給唐朝的國書，在日本正史中並無記載，並推測這是因為國書的形式採取臣下向皇帝上表的形式，因此不願意把它記錄到日本的正史中（頁104-405）。這不就是值得作者大書特書的一點嗎？這顯示出日本對自己國家地位的確立，由此發端便可看出日本文化的深層因素。同樣的例子，筆者還可以再舉一個以饗讀者。作者談到《伊

吉連博德書》的記載。此書之所以珍貴，是由於遣唐使自己的記錄文書幾乎都沒有遺留下來，所以使此書變得彌足珍貴。《伊吉連博德書》記載了遣唐使節與唐朝皇帝問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使者們稱呼日本的統治者為天皇。作者推測這是之後《日本書紀》的編纂者加以潤色的（頁106-107）。這不正是日本宣示自己國家地位的最好例證嗎？可惜作者捨此不圖，三言兩語匆匆帶過，卻浪費大量篇幅去描寫儀式發生時的種種過程。

無論從歷史敘述技巧，或是歷史解釋，筆者對本書內容有所保留，但想要趁機了解大唐帝國各方面的掌故，這本書的功能還是有的。 ISBN

ISBN 13碼新制

13碼“ISBN”印製

在2007年1月1日以後，所有出版的圖書只須印製13碼“ISBN”。

在2007年1月1日之後，取得13碼“ISBN”的出版品，應在版權頁及無商品條碼的封底印製13碼“ISBN”外；印製條碼時，在條碼上方，也須一併印製視覺可見的13碼“ISBN”，而其數字間應含連字號(-)串接。

